

追随“爱尔兰的詹姆斯”的脚步——爱尔兰传教士在中国

休·麦克马洪

袁法森 译

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到访中国的爱尔兰人是一位神秘的方济各会修士“爱尔兰的詹姆斯”。他在 1318 年至 1330 年期间，差不多是马可·波罗著名的东方之旅五十年后，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踏上了前往世界各地的史诗般的旅程。

詹姆斯在霍尔木兹（忽里模子古国）随同鄂多立克前往印度，从那里他们又一起乘船前往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然后再抵达中国的广州。从 1323 年到 1328 年，鄂多立克和詹姆斯在中国各地游历和布道。在此期间他们还在北京大汗宫待了三年，这可能与年迈的方济各会大主教孟高维诺主持的教堂有关。回到意大利以后（经中亚由陆路返回），鄂多立克在他去世前不久口述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并由他人记录整理成游记。尽管鄂多立克游记的声誉受到了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拙劣版本的影响，但是它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跟当年马可·波罗的记述相媲美。而詹姆斯最后一次被提及是在 1331 年，当时鄂多立克的家乡乌迪内的优秀公民们为了表彰詹姆斯陪同他们的杰出英雄一起冒险，授予了他两大荣誉称号。

鄂多立克的大部分记述都与他们在旅途中所看到或听到的奇闻逸事有关。其中许多都是对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亲眼见证，例如他对鸬鹚捕鱼、留长指甲、缠足等习惯的描述。但是有些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地方的东道主告诉他

们，当地有一种成熟的甜瓜爆裂开来以后，里面会出现像绵羊一样的小动物，这种甜瓜能同时给人们带来果肉和羊肉。当詹姆斯听到这个后，他显然不甘示弱，回应说爱尔兰有一种可以生长出鸟类的树！

除此之外，詹姆斯与他遇到的人分享了什么，或者他是如何被这段经历所改变的，我们对这些都知之甚少。直到五百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长老会教徒、圣公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等基督教传教士们才追随詹姆斯的脚步来到中国。他们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充满变故的时代，他们不得不应对自从 19 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开放以后接连遭遇的日本入侵、国共内战以及各种自然灾害。最终到 1954 年，在革命共产主义政府的统治下，所有的传教士都被迫离境或被驱逐出境。

漫长的四十年以后，当中国再次向更广阔的世界开放时，我有了机会去发现当年那些爱尔兰传教士们所留下的印记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我当时被派到香港担任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经理，负责派遣志愿者到内地的各个大学任教。因此，我有幸访问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的许多主要城市。不过，我首先要在武汉学习五个月的普通话，虽然语言方面的进展缓慢，但是学习语言是追寻爱尔兰传教士们从前在中国的活动痕迹的一个理想起点。

武汉：灾难与学者

武汉是一座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尽管长江武汉段距离入海口有 1100 多公里，但是它仍然可以通行远洋船舶。今天，人口超过一千万的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武汉是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座被长江及其支流汉

水所分割的姐妹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武昌是长江东南岸古老的省会城市，汉阳是与武昌隔江对望的工业重镇，汉口是位于汉水北岸历史悠久的外国租界。

从历史上看，长江和汉水使得武汉成为该流域的交通和商业中心；但是这两条河流的泛滥也带来了定期的洪灾。1931 年，一场特大洪水导致了 15 万人死亡，汉口一座银行大楼一侧的暗线仍然见证了当年水位达到的高度。洪水淹没后出现了伤寒和霍乱，接着是麻疹和天花。

那时候，武汉有两个爱尔兰团体立即对这次灾难做出了反应。在汉口，包括来自科克郡斯基伯林小镇的医疗传教士莎莉·沃尔夫在内的爱尔兰卫理公会传教士们经营的医院躲过了洪灾，但是很快就挤满了前来避难和就医的人群。在汉水对岸的汉阳，爱尔兰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不得不放弃他们被洪水淹没的农村教区，转而与其他难民一起到城市避难。虽然这个宗教团体仅仅在十三年前才成立，但是他们在中国已经有六十四位神父，其中有四十位在汉阳地区。他们的主教爱德华·高尔文报告说，“教会周围到处是无助、饥饿的群众。我在中国的这些年里（当时是第十五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景象。从我们住所后面的山上到整个乡村，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汪洋一片。我们无法减轻难民所遭受的痛苦，但是我们正在尽力而为。”当时，教会的住所本身有 4.5 米淹没在水下，神父们只能使用住所的上层，在那里组织救援行动。与此同时，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的修女们刚刚在附近修建了一座修道院，提供给了 436 名妇女和儿童来避难。更为混乱的是，土匪们乘船洗劫了几乎荒废的村庄，还绑架了一名叫休·山德斯神父，这一类事件在变得越来越频繁。

1938 年又发生了另一场重大灾难，洪水在 8 月再次冲垮了河堤。最糟糕的

是，日本军队在向中国内陆缓慢推进，他们开始对这三个城市实施每日轰炸袭击。当有八万五千名难民毫无疑问会涌入武汉时，高尔文主教被任命为了武汉难民区委员会主席，开始组织为洪水灾民和战争难民提供食物和住所。为了更好地协调救援工作，他搬到了汉口，在那里他被邀请留在卫理公会医院。当日本军队最终占领汉口，并命令七万名难民搬到城外的难民营时，高尔文主教组织和带领了大批难民的迁移。据一位目击者说，当高尔文主教看到一个跛脚的男孩蹒跚而行时，他“把他背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沿着悲伤的人群队伍，带着他安全地穿过汉口密集拥挤的街道。”

目睹所有这些事件的是医疗传教士莎莉·沃尔夫。自从她 1915 年来到中国以后，无论种族或宗教信仰，她都不知疲倦地为病人和伤者服务。在日军占领期间，她在汉口附近的钟祥市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士兵霸占那里的医院。早先的时候，她收养了三个中国婴儿，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当她在 1951 年最终离开中国时，这些孩子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她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任何消息。在她离开汉口的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向她赠送了两个卷轴，其中一个卷轴上写着：“她的名字享誉中外，她的美德堪比黄金。”她回到科克后，在 1975 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如今，她的事迹在一本名叫《她把心留在中国：医疗传教士莎莉·沃尔夫的故事 1915-1951》的书中得到了纪念。而高尔文主教因为被指控“反对并阻挠在中国建立独立教会”，在 1952 年 9 月被驱逐出境。

当我 1995 年来到武汉时，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所居住的建筑仍在那里，并作为一所中学来使用。高尔文主教在汉阳建造的简陋教堂后面，也还保留着他自己的小房子。村庄里的人们开始询问他们所认识的爱尔兰牧师和修女们什么时候会再来看望他们。

然而，我在 1995 年所认识到的武汉已经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了。尽管人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生活、购物、学习和接受医疗这个旧社会主义单位制度的痕迹仍然存在，但是现代化已经开始了。我在武昌的湖北大学一个只有两名学生的班上学习，老师是一位退休教授，他相信让学生每天背诵一页文本的传统教学方法。我的同学是一个来自昆士兰大学的年轻人，每天下午他都学习传统绘画和武术，让我独自和这位相当严厉和令人生畏的教授在一起。他不太会说英语，我的中文词汇量又有限，因此我只好依赖于自己的韩语知识以及一本附有对应中文单词的韩语词典。

在这段学习的期间，我根据自己在韩国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向他请教有关传统和传统表现形式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年轻时那样的儒家传统就存在着，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断了。当我告诉他，不仅在古老的成均馆大学里，而且在人们日常语言和习惯中，韩国都在设法维护儒家精神时，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直到 1906 年，武昌一直都是年轻人参加那些重要的科举考试的省级中心之一，科举考试将决定他们能否谋取一官半职，进而决定他们的家庭命运。这位教授本人，虽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也是那种传统的产物。就像我很快意识到，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儒家思想在它的发源地中国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就儒家绅士或君子而言，他在语言上小心谨慎以免得罪人，并且得体而有尊严地经营家庭和事业。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从小就相信，通过发展“内圣外王”，他的思想、他的家庭和他的国家都会找到各自的和平与和谐，从而造福于所有人。

虽然我来自主张彰显自我的欧洲，但我还是惊讶地发现，事实上西方并没

有垄断个人主义。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也以发展个人精神为中心。传统上，在那里个人自身利益位于社会责任之后。为了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也为了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个人首先必须要了解和管理自己。这种自律和乐于向他人学习的态度在“君子”一词的释义中得到了体现：一个每天都在寻求对自身和周围世界更深入了解的人。在西方，这种自我控制和自我贬低似乎是有约束性的；但在中国则至今仍被认为是文明开化的第一步。

中国人并非从未意识到个人财富的吸引力。孟子是孔子最著名的追随者，他在《孟子》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拜见梁惠王的故事。梁惠王问孟子：“你一定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如果大王问‘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就会问‘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贵族和老百姓也会问‘怎样使我自己有利？’，那么结果就是人人因相互争夺利益而全都受苦遭殃。孟子总结道：“我是来教导孔子的仁和义的，如果这些能够使得国家和人民繁荣昌盛，那么就没有必要提及利了。孔子曾说过，‘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都必须把人的修养视为一切的根本’。”

对我的武汉教授来说，这样的态度很自然，尽管他可能没有觉察到这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我忽然想到，爱德华·高尔文主教应该会在像教授这样的人身上，发现一种他在爱尔兰老年人身上所知道的尊严、谦逊和对学识的尊重。中国人倾向于使用礼貌的语言来避免直接的对抗，也倾向于间接地表达他们的愿望，这在爱尔兰的传统中并不为人所知。对他人的尊重和对双方共同利益的尊重无疑根植于这两种传统之中，但是儒家通过仪式、教育和家庭生活使其制度化，这一点仍然让西方人感到惊讶。

长春：法律与关系

长春是一座位于中国寒冷的北方地区，距离武汉三个小时航程的现代化城市。它曾是一度由“末代皇帝”溥仪短暂统治过的日本伪满洲国的首都，至今溥仪的皇宫旧址仍然保留着。长春也是著名的中国电影制作中心和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作为省会，长春有超过 27 所大学，其中至少 6 所大学有我们的老师，因此我经常會去那里。

这些老师中有一位是在吉林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律师。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喝了几杯他最喜欢的樱桃白兰地后，他描述起了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向他的学生们解释民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区别：民法起源于罗马，以法典为基础，是中国的基本制度。普通法起源于英国传统，以判例为基础，它已被世界上许多地方采用，因此也成为了中国法律课程的一部分。等他说完以后，我问他中国是否在努力维持自己传统的法律态度。他让我解释一下，我引用了孔子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相比之下，修筑长城的秦始皇采取了严格的法律法规来统一国家，从而引发了一场法家学派与传统儒家之间的争论。法家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因此需要用严厉的法律和惩罚来控制人们的冲动。然而，主流的儒家相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认为人们只需要接受教育就能展现出他们最好的一面。幸运的是，孔子的弟子们占据了上风，这种重视教育人们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做法又延续了两千年。我相信，这种教育是中国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保持如此强大和独特的真正原因。

这种教育的核心是从小就培养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朋友之间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负责的关系。这种思想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孔子和叶公之间的讨论，他在孔子拜访时吹嘘说：“我们这里有正直的人，如果父亲偷羊，儿子就会告发。”孔子非常震惊地回答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是不同的。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种观点的差异至今仍引发着争论，因此即使在一千年后，著名的宋明理学家朱熹也会重申：“儿子可能会撒谎来掩盖他父亲的偷窃行为。”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的澳大利亚同事认为，在一个商业毫无例外都需要保障措施的世界里，实施这种做法存在困难。无论如何，在商业领域旧态度的存续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当涉及到签订合同时，西方商人会感受到它的影响。在中国，一份书面协议，无论起草或见证得多好，都可能只是一纸空文。经济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出现暂时的困难，因此书面文字可能会失去其相关性。商业活动得以成功是基于双方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让双方能够克服困难并顺利完成项目。

事实上，正是在长春，著名的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安德鲁·威尔直面了成文法典与人文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满洲里的第一个任期（1900-1908）快要结束时，他开始质疑教会的所有教条是否都同等重要，并且都不可更改。中国北方的情况显然和爱尔兰国内的情况不同。例如，遵守严格的安息日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情况，安德鲁·威尔认为福音的精神比规章制度更为重要，他在谈到教条时说，“不要把它当作束缚人的枷锁。”一个人只要认同《威斯特敏斯特信仰信条》的基本教义就足够了。这种儒家式的运用人性化考量和寻求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在满洲里长老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00 年，安德鲁·威尔第一次从爱尔兰蒂龙郡的库克斯敦来到满洲里，恰好经历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创伤。更糟糕的是，传教士们在传播福音的同时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努力，不断受到土匪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时遭遇的困难所干扰。安德鲁·威尔担任长老会牧师长达二十七年，始终都致力于使满洲里教会自治、自立和自主传道。到 1933 年他在长春死于斑疹伤寒时，这些目标都已经基本实现。他的儿子杰克出生在长春，后来作为长老会会议的主席，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扮演了备受尊敬的角色。在这个角色中，他表现出了他父亲在为棘手问题寻求实际解决方案时的开放心态和坚韧精神。他这种为显然无法解决的价值或原则冲突找到务实解决方案的技巧，很可能是从他父亲在中国的角色中汲取的一个经验。

如今，长春市的市中心矗立着一座可以容纳六千人，“以爱尔兰新教教堂风格建造”的雄伟教堂。它最初在 1897 年由英国长老会教徒所创建，1959 年被中国政府管理的三自爱国基督教会（中国基督教的官方代表）接管。1998 年，在原址上建造了现在的教堂，旁边则是最初由爱尔兰长老会教徒经营的长春妇产医院。作为安德鲁·威尔在满洲里生活和工作的大本营，这两个机构见证了他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爱尔兰传教士所留下的遗产。

福州：中国科学与西方教育

福建省的沿海省会福州，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鄂多立克和詹姆斯早在七百年以前就走过这里的街道，他们发现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我们老师所在的学校位于南台，那里曾经是闽江中的一个岛屿，但现在与对面的老城南岸相连。1844年，正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外国租界：一块由西方领事馆、教堂和学校组成的，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及其周围的小飞地。今天，人们仍可以去探访这些半废弃建筑的遗迹（如果你愿意爬过那些狭窄的小巷）——尽管随着该地区现代化改造的进行，这些属于另一个时代的遗迹可能不会长久存在。

外国人最初被隔离在河对岸这个地区，是因为当地人不希望他们住在自己的城市。因为南台岛有一个据说会闹鬼的古老墓地，所以没有中国人愿意住在那里。如果鬼魂缠着西方人，那反而更好了。直到后来，西方人才开始了解中国人对待鬼魂的态度。在中国，人们自古以来就相信一个人至少有两个灵魂。物质或肉体的灵魂（鬼）会在人死亡时离开身体，但仍然会在坟墓附近或死亡的地方停留三年或三年以上。这些可能是出没在像南台这样的岛屿上的“鬼魂”，人们不得不经常用食物来祭拜他们，以免惹恼他们。另一个精神的灵魂（神）会在人死后立即离开身体，继续前往它永恒的目的地，无论这个目的地是天堂、地狱、涅槃或者其他地方。

当我在韩国遇到一位以诊断各种墓地问题而闻名的牧师时，我已经开始理解这种态度了。那位牧师的任务是找出为什么埋葬在那里的人的灵魂会回来给他的后代带来厄运、疾病或家庭问题。我想知道，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怎么能相信一个本来应该死后升入天堂或其他地方的灵魂会回来打扰生者。只有当他向我解释多灵魂信仰时，我才明白这仅仅是鬼魂回归了，它们需要得到安抚。

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怪异，但仅仅把它视为奇怪是不够的。在爱尔兰，难道我们不是在事故发生的地方找到祭坛，并在坟墓上摆放鲜花吗？难

道爱尔兰人不也曾相信，人至少有两个灵魂，其中一个可能会留在老地方游荡一段时间吗？著名的非洲学者约翰·泰勒对非洲大陆上的灵魂也持同样的态度，并拒绝立即谴责它。他将我们有限的理解力归咎于缺乏想象力，他写道，“现代思维把自己禁锢在意识和理性的保护墙内，从而触及不到潜意识的深层，也想象不到人类原始力量的辉煌。”

然而，当地中国人强迫外国人居住在他们的城市之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西方人的教堂等高层建筑破坏了当地的风水。风水是风和水的流动，它调节着积极影响的效果（一种被称为“气”的客观力量），并在实际中决定着该地区运气的好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爱尔兰圣公会在福州的传教会最终来到了南台。虽然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认为风水是迷信的，但是它的影响甚至在现代中国仍然存在。除了基于常识性的方法，比如在面向太阳、避开地下水、靠墙或山来挡风的地方建造房屋或坟墓之外，针灸从业者们还可以证明风水的其他优点。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对“气”这种生命力量的信仰，这种信仰也是从实际观察，以及一种西方科学家可能难以接受但是艺术家可能会羡慕的直觉发展而来的。

例如，在港岛区有一幢 50 层的著名豪华公寓楼，在大楼最中间的地方有一个相当于 16 套公寓大小的缺口。这个“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建筑装饰，但事实上是听从了那些检测和解读“气”运动变化的风水专家而设计的。他们诊断，从公寓背后山上流出的“气”（和好运）会被坚实的建筑物所阻挡。因此他们建议在公寓楼的正中心开一个“洞”，让“气”流通。香港精明的开发商愿意承担相当于 16 笔商业租金的损失，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对“气”的态度仍然是认真严肃的。

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即使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有着不同的视角，但它也同样被广泛地相信和应用。尽管中国在吸收基于分析推理和有形实验的西方科学的长处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困难(最近在交通、通讯和工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就是证据)，但是中国的传统仍然足以提醒他们，在现实的其他方面，这种逻辑是不相关的。

这并不是中国古代信仰第一次也不是唯一一次，试图干涉福州基督教教会的建立。19 世纪 40 年代初，随着中国向西方的开放，爱尔兰圣公会的个别传教士跟随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圣公会差会前往中国。其中最早的一位是威廉·拉塞尔（禄赐），他于 1847 年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宁波开始了自己的传教生涯，并于 1872 年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位英国圣公会主教。为了支持他的工作，1885 年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毕业生们成立了一个不同于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圣公会差会的组织，它被称为都柏林大学远东教会。理查德·斯图尔特（史萃伯）是其中较为知名的成员之一，虽然他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但当他去中国时已经成为了英国圣公会差会的成员。理查德·斯图尔特出生在都柏林一个显赫的家庭，当 1875 年他志愿去海外传教时，他正在伦敦学习法律。1878 年，他在圣保罗大教堂被任命为牧师，之后与路易莎·史密利结婚，并于同年 9 月和她一起前往中国。

他们被派往福州一所新的神学院，一到那里就立即感受到了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教会从福州乌石山上的一座道观租来了一块土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一所神学院。随着这座三层楼的墙体越筑越高，当地人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大，因为这破坏了他们的风水。中国官员提出用南台原电线局的一处房产进行交换，但是传教士们拒绝了。1878 年 8 月，一群暴徒袭击了这个地方地点并

放火烧毁了这座建筑。在随后被称为“乌石山教案”的事件中，领事法院裁定道观有权收回租地；直到那时，传教士们才勉强接受了租赁南台土地的提议。

此后理查德·斯图尔特继续在福州及周边地区开展传教工作，他在农村建立学校，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福州高中学习三年，并鼓励有兴趣的毕业生加入福州神学院。直到 1895 年 8 月，这些传教活动才因为后来被称为“古田教案”的事件而突然中断。当时理查德·斯图尔特带着家人去了距离海边约 70 公里的古田华山避暑胜地度假，当地一个斋教教徒们袭击了传教士们所在的院落，杀死了 11 个人。这些受害者中包括了理查德·斯图尔特、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爱尔兰保姆海伦娜·叶洛普。据说，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三一学院的学生们志愿去中国传教。

这种信仰体系的冲突通常不会以如此悲惨的结局告终。福州的圣公会传教士们和大多数初到中国的人一样，可能对中国人对待法律和租约的态度，或者对待风水和鬼魂的态度反应迟钝，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接受了教育和行政改革的需要，延续了千年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最终在 1906 年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西学和外语越来越流行。1907 年，作为英国圣公会差会成员的都柏林牧师帕根汉·沃尔什（万拔文）来到福州后，他在南台创办了圣马可书院。不久之后，这所书院与一所中学和小学合并成立了福州三一学校。圣马可书院保留了学校中英双语方面的特色，大部分课程都以英语为媒介。正如学校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大部分教师都是服务于都柏林大学远东教会的爱尔兰传教士。1928 年，当民族主义席卷全中国时，最后一位外国学校校长辞职；但讽刺的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前，学校

一直都非常受欢迎。福州三一学校在毛泽东时代改为福州市第九中学，现在作为福州外国语学校与都柏林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远东教会重新建立了关系。

当然，爱尔兰圣公会的传教活动远不止福州和圣马可书院。1897 年，出生于贝尔法斯特的约翰·欣德（恒约翰）成为福建教区的主教，实施了一项重视当地神职人员的政策。1907 年，来自都柏林的赫伯特·莫洛尼（麦乐义）成为浙江教区的主教，他担任这个职位长达 20 年，在为中国圣公会制定独立章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1929 年，都柏林出生的约翰·柯蒂斯（高斯德）作为浙江教区的主教接替了赫伯特·莫洛尼，当他在 1949 年被驱逐出境时，他可以自信满满离开并告诉其他人，“我们正在从传教关系转到教会关系。”

持久的影响？

如今，在武汉、长春和福州，爱尔兰传教士们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医院、学院和教堂里仍然可以追踪到他们的足迹。到 1954 年，所有传教士都被迫离开中国。不过回国以后，他们分享了那些对他们所认识的人的美好回忆，以及关于一种文化的故事。这种文化有时似乎与他们自己的西方成长环境背道而驰：那是一个书籍从后到前阅读，人们“和自己握手”的颠倒的世界。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传教士们和他们曾经认识的人们和机构重新建立了联系，并且拜访和支持他们努力实现与时俱进和自力更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时间反思他们在中国的经历，经常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更深层次。

尽管最初有所疑虑，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时期，爱尔兰传教士在与中国

不同地区的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本能地从中国人的自尊、友好和善意中认识到一种可靠的共同人性。如果他们按照君子“圣人”的形象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些印象，爱尔兰传教士们很可能会想到他们在家乡所认识的长辈的礼貌举止和自我价值感。由于中国人对更广泛的、非物质的现实持有开放态度，以及不情愿使用非黑即白或非真即假的区分手段，因而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是创造力和想象力曾经让爱尔兰人享有诗人和小说家的美誉。最后，中国人对“关系”的重视、对人际关系的利用以及对严格法律法规的怀疑，这些都是爱尔兰传教士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正是这种以直觉而非教会层面与人相处的能力，才使得爱尔兰传教士们能够在中国做出他们最大的贡献。

这种寻找中国和爱尔兰传统习俗相似之处的做法，现在会不会变成一种怀旧的行为？这两种人文传统都面临着被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淹没的危险。然而，在比较这两种文明时，中国或许比爱尔兰更有可能保持其独特的以人为本的特点。中国在人口数量、国家规模和文化寿命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它保持其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这个国家有一段从西方汲取其认为有用的东西并使之适应“中国特色”的历史，正因为保持了这些“特色”，才保持了中国的统一和独特。

鄂多立克和“爱尔兰的詹姆斯”在中国待了五年之后，从“地球的另一端”给人们带回了一种令欧洲惊叹的富有教养的生活方式。20 世纪的爱尔兰传教士们在中国度过了了几十年，并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一道，带着对中国文明，尤其是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更为详细的描述和更为深入的理解回到爱尔兰。如果我们不再延续这样的传统，那么爱尔兰和西方世界的国家就会因为没有人来挑战它们自身为人类进步和发展树立了榜样这一假设，从而成为时代的弱者。